

· 学术争鸣 ·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80师失利有关问题之我见

严可复

摘 要: 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80师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后撤阶段中的失利原因和责任,本文依据史料认为,对志愿军各级指挥机关的责任应作具体分析:志愿军司令部的责任主要是战役计划、组织、部署和指导方面的,并未直接造成第180师的损失;第3兵团领导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部署上出现大的疏漏,转移阶段又布置不妥,对第180师的损失负有重要责任;第60军领导只是机械执行命令;第180师指挥员在后撤阶段中犯了麻痹大意、布置失当和组织不力的错误,是造成该师失利的主要原因。第180师在包围圈内的人员损失高达7000余,占整个兵团人员损失总数的约五分之一,是此次战役损失最严重的一个师。

关键词: 志愿军第180师 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 作战经验教训

中图分类号: E2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451(2014)01-0133-12

作 者: 严可复,上海大学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上海 200072)

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后撤阶段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80师遭受重大损失。由于过去有段时期对这一事件和相关人物多采取回避态度,造成相关资料缺乏、史实混乱甚至舛误,给我们今天完整审视这一历史事件带来了不少困难。本文从目前所能见的有关资料出发,对第180师的某些情况、战斗过程、失利原因和责任等作一辨析,以试图厘清部分史实。由于目前仍然缺乏充分的原始资料,本文肯定存在不足和缺点,希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教。

一、关于第180师失利的原因

关于第180师失利的原因,目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第180师的失利,主要是该师领导及各级干部动摇逃跑所致。时任第60军政委的袁子钦在关于第180师总结报告中提出,该师之所以受挫“政治上动摇逃跑是基本原因,军事上的原因是被围的(原)因,不是覆没的原因,强调军事的错误,是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说明了原一八〇师政治上底子不厚”。^①1951年11月19日,根据袁子钦政委的总结和第3兵团政治部主任刘有光的指示,第60军对第180师受挫原因作出的结论是“政治上动摇逃跑是受挫的基本原因。180师底子不厚,政治上对敌我认识上右倾,党员干部责任感不明确。”^②上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编写委员会所编《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草稿)》亦指出:“第180师遭受损失,主要是师长失去共产党员的应有意志,右倾动摇,没有坚决率领全师突围,而

^①《资料之九:60军政委袁子钦〈关于一八〇师受挫的总结报告〉》,1951年11月6日,《关于一八〇师回撤失利》,180师回忆录编委会编印,1992年,第31页。

^②《李钟玄战斗日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352页。

拆电台、烧密码、集合干部,抛弃战士分散突围,致主力遭受严重损失。”^①以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右倾动摇”成为解释第 180 师失利原因的标准结论。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原第 60 军军长韦杰在接受访问时,仍坚持认为“180 师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动摇,在敌人面前屈服。怕,吓怕了。师党委解除了武装,丢武器,烧密码,烧文件,加快了部队的松散解体。”^②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第 180 师“正确、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之所以失利主要是上级的判断失误,“指挥失当,陷入不拔”。^③持这种看法的,多是当年突围归队的中下级干部。如原第 180 师参谋长王振邦就认为,“60 军军史中把失利责任推到 180 师身上就不符合我党一贯坚持的求是作风”,“对受挫原因、责任,军和师认识不统一,作出的结论,不尽符合实际。不弄清查准是与非情况,硬以‘各级政治动摇’,‘建党建军都有错误’的帽子来处理,不能服众,遗留的矛盾问题更多”。王振邦对第 180 师在第五次战役中的表现评价很高,称该师的阻击行动“拖住了向春川、桦川方向进攻的几个美军师,保证了主力转移及伤员北运。对制止敌人冒进,稳定战役全局,起了重要作用”。^④原第 180 师第 538 团参谋长胡景义也认为:“180 师的失利,主要是指指挥上的问题,不能把军事问题说成政治问题,不能把失利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政治动摇’。”^⑤后一种看法近年来似乎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

今天回头再看,当年某些领导按照事先定下的调子,“只准讲政治动摇,右倾怕死逃跑,不准讲军事指挥问题”,^⑥对第 180 师失利所作出的结论过于简单,把板子统统打在该师干部战士身上,将责任完全归之于该师干部战士,这是不公平的。但另一方面,出于对这种不公平处理的反弹,有的书籍或文章只讲第 180 师干部战士的英勇作战,不提或少提该师领导干部的重大失职,将主要责任归到军、兵团甚至志愿军总部,也是一种不客观的态度。事实上,第 180 师既没有能“拖住了向春川、桦川方向进攻的几个美军师”,也没有达成“保证了主力转移及伤员北运”的目的。据统计,整个第 3 兵团“遗弃重伤员共约六千余人”。^⑦该师在突围过程中,本身即遭受到 7000 余人的重大损失(伤亡、被俘、失踪),更谈不上“对稳定战局起到应有的作用”。如何适切地分析失利原因和责任,是值得我们深入反思的。

第 180 师在第五次战役中作战失利,受到严重的损失,除客观原因外,主观上的失误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从战役指导思想上来看,第五次战役回撤阶段,志愿军司令部的基本判断是敌“尾我北犯”,以为敌人仍会采用过去的“磁性战术”,追踪疲劳消耗我军,将敌大规模有计划地进攻估计为骚扰战。由此判断出发,兵力部署不当,造成阻击战初期非常被动的局面。^⑧志愿军高层对敌利用机械化、摩托化装备快速反扑的估计不足,转移部署不够细致,“当美第 3 师东援,伪第 8 师北调,敌迅速堵

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编写委员会《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草稿):一、战争简史》,1956 年,第 54 页。

②吴金锋记录整理《1984 年 5 月 24 日对韦杰的采访记录》,《安德舍笔记第一集》,第 29 页。

③陈忠龙主编《屡创奇迹的 60 军》,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年,第 452 页。

④王振邦《一八〇师受挫的始末》,180 师回忆录编委会编印《一八〇师实战录(征求意见稿)》(第 3 册),1994 年 3 月,第 11—5 页。

⑤胡景义《我在回撤失利中的经历》,《一八〇师实战录(征求意见稿)》第 3 册,第 11—14 页。

⑥王振邦《一八〇师受挫的始末》,《一八〇师实战录(征求意见稿)》第 3 册,第 11—9 页。

⑦《第五次战役作战中几个问题的材料》,1951 年 7 月 1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史教学参考资料(抗美援朝战争时期)》,1981 年 7 月,第 14 页。

⑧张振川《对抗美援朝一段被动作战的剖析》,《鏖战疆场——张振川回忆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67—378 页。

塞其战役缺口及我粮弹接济不上时,即果断停止进攻是正确的。但没有估计到敌人会很快向我转入反攻和追击。因此对转移的组织计划不周,造成被动”,^①对整个回撤阶段的损失显然是有责任的。另外,上下级联络、沟通也存在极大的问题。志愿军司令部1951年5月21日16时的命令,仅规定各兵团转移地域和留置阻击的兵力,对于各兵团、各军之间的协同未作详细规定。各兵团、军之间又彼此缺乏配合、不通气,如第64军和人民军第1军团后撤,使第65军两翼暴露,遭受敌猛烈攻击;第63军、第15军的后撤,又造成第60军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有的部队撤收过早(如第15军),却被认为是撤收动作快,措施得当。^②这反映各个部队对整体局势缺乏了解,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战后的总结中也提到“第二阶段,六三军五月二十三日即从加平以南撤至北汉江北,他左翼的六十军到二十四日才知道,……等各自为战的现象是严重的。”^③

然而,志愿军司令部所应负的责任主要是战役计划、组织、部署和指导方面的,并未直接造成第180师的损失。第五次战役中参战部队较多,军、师一级的行动一般均由兵团负责组织实施,因此具体到第180师的失利,主要责任应该针对兵团、军、师这几级加以分析和研究。

二、关于第3兵团、第60军的失误及责任

就兵团一级而言,第3兵团领导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部署上出现了大的疏漏,转移阶段又因布置不妥,电台被炸,失去指挥长达3天之久,对于第180师的损失负有重要责任。

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交战双方打成平推以后,战线呈一斜线,美军东线翼侧暴露,彭德怀决心移师东线,歼灭南朝鲜军3至5个师。第3兵团的任务是中央突破,割裂美李军的联系并阻击美第10军团的东援,保障第9兵团翼侧安全。第3兵团指挥第60军、第15军和第39军的2个师(第115、第116师),第12军调归第9兵团指挥。第3兵团司令员王近山认为第39军(隶属第14兵团)已经连续参加了四次战役,而本兵团各军都是初上战场,应该给予更多的锻炼机会,所以将第39军放在二线,集结在春川附近,担任兵团预备队(该军第117师北移成川地区休整),将第60军和第15军放在一线。其中第60军的任务是在揪谷里至大龙山地段上积极牵制美陆战第1师、美第7师并力求歼敌一部。

第60军军长韦杰、政委袁子钦考虑到战役第一阶段第179、第181师都已经参战,第二阶段需要给第180师一个锻炼机会,且该师减员不大,可以担负任务,因此决心以第180师为第一梯队,要求5月14日进至元塘里、月头峰、退洞里地域,在春川、加平间选择敌弱点,实施攻击。

但就在第二阶段战斗开始的当晚,第3兵团首长突然指示第60军首长将第181师调归第12军指挥,参加歼灭自隐里、寒溪之美军第23团及南朝鲜军第5师,令第179师机动至春川以东地区,调归第15军指挥,以增强突击力量。^④

这样一来,第60军牵制美陆战第1师、第7师的作战任务完全落在第180师一个师的身上,第60军连预备力量也没有了。由于第二阶段作战开始较顺利,南朝鲜军的迅速崩溃,使得美军的重点放在堵漏而不是反击上,第180师左翼又有第63军(以清平川、梅谷里为进攻目标),因而不必

^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编写委员会《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草稿):一、战争简史》,第53页。

^②《秦基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350页。

^③《第五次战役作战中几个问题的材料》,1951年7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史教学参考资料(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第8页。

^④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军精简整编善后工作办公室编《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军军史资料汇集(1947—1985)》,1985年,第171页。

过分担心。但转移阶段中,第 63 军一撤,第 180 师的翼侧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第 3 兵团参谋长王蕴瑞战后总结认为“二阶段中错误更多更严重: A、违背志司命令,擅自将 60 军主力 181 师、179 师由春川以西调到春川东北地区使用,正面助攻力量过于薄弱,这是一错。60 军主力虽已东调,仍可机动使用,或用于正面补救之,但是又迅速在寒溪南北地区投入战斗,这是再错。即便如此,还有 39 军两个师在春川以东地区尚可补救,可是过早的(20 日)将该军撤走,这样就造成了百余里地区不可弥补的一大空隙,为敌所乘,同时 180 师也因之而更加突出和孤立。这个缺口是一而再,再而三,一连串错误所铸成的。”^①

回撤阶段第 3 兵团的布置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按照志愿军司令部 5 月 21 日 16 时的命令:“各部统于 23 日晚开始向指定地区移动”^②,第 3 兵团擅自提前了一天,命令 22 日晚向指定地域转移(第 3 兵团 5 月 22 日 17 时命令)。当发现各军伤员来不及后撤,5 月 23 日上午第 3 兵团又改令“各部暂不撤收,并于前沿构筑坚固工事,阻击敌人,运走之后再行撤收”,朝令夕改,令部队无所适从。

王蕴瑞的报告中亦指出“在撤收时间上,也是违背志司命令的,志司规定 23 日北撤,而兵团于 22 日夜北撤,15 军则于 22 日夜北撤的,由于该军撤收的过早,不仅使已造成的缺口更加扩大,而且使整个东线处于危境”,“因伤员尚未运完,即急躁不冷静轻率的命令各部暂不撤收,掩护运转伤员,因而引起 60 军的误解,致使 180 师迟撤而处于不利地位。”^③

之所以如此随意变更部署,主观上还是由于轻敌大意。原第 3 兵团机要处处长彭相臣在接受访问时回忆道“我们接到命令,就向兵团参谋长提意见,快收拢部队早撤。参谋长笑笑,说早一天晚一天,没啥了不起,显出了轻敌的情绪。……当时我前方队伍,都是这样一派胜利骄傲的情绪,什么都不在意。”^④

在轻敌情绪影响之下,第 3 兵团指挥所的转移组织也考虑不周,没有采取交替转移的方式保持连续的指挥。结果,“兵团(5 月)23 日晚由古滩岭向沙金鹤转移行经山阳里以东地区,遭敌机终夜封锁轰炸,电台、汽车被烧毁两辆,电台人员及机要人员跑散,译电员饿饭两天步行至沙金鹤,至 26 日人员才到齐恢复联络,所以与各军三天中断指挥”。^⑤战后的经验总结中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第 3 兵团司令部转移的组织计划不周,在转移中遭受空袭中断指挥 3 天,这是使部队混乱受损失的原因之一。”^⑥

对第 60 军首长此役指挥的指责,多集中在“机械执行命令”和“救援不力”这两点上。但从当时的背景出发,考察整个过程,可以说第 60 军首长的处理基本上是适切的,相对于兵团和师来说,责任较小。

5 月 24 日,第 180 师副师长段龙章和参谋长王振邦曾向师长郑其贵建议,主力迅速北渡汉江,但郑其贵与军部联系后,坚持不能北撤。^⑦对此,有人认为,“60 军首长在这种情况下几乎到了机

^①《资料之五:三兵团参谋长王蕴瑞〈对五次战役认识的报告〉》,1951 年 9 月 21 日,《关于一八〇师回撤失利》,第 13 页。

^②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抗美援朝战争史》第 2 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年 9 月,第 341 页。

^③《资料之五:三兵团参谋长王蕴瑞〈对五次战役认识的报告〉》,1951 年 9 月 21 日,《关于一八〇师回撤失利》,第 14 页。

^④吴金锋记录整理《1984 年 7 月 8 日对彭相臣的采访记录》,《安德舍笔记第一集》,第 29—30 页。

^⑤《资料之十三:志司作战处关于六十军一八零师受损失经过材料汇集》,《关于一八〇师回撤失利》,第 4 页。

^⑥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编写委员会《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草稿):一、战争简史》,第 53 页。

^⑦王振邦《一八〇师受挫的始末》,《一八〇师实战录(征求意见稿)》第 3 册,第 11—6 页。

械执行命令的程度,使不利的态势发展到危险的境地”。^①

但当时的情况却绝非如此简单。第60军的两个主力师被分别配属给第12军和第15军,23日刚刚归建,还在春川以东大龙山、勿老里、插桥里地区,与预定防御地区尚有一定的距离。第60军要完成兵团所下达的掩护伤员转移的命令,就必须依靠手中唯一能掌握的第180师迟滞敌人的进攻,以便完成整个防御部署。更重要的是,第60军首长拒绝郑其贵率第180师北撤汉江的请求,发生在24日晚之前,当时,第60军首长并不确知友邻第63军已经后撤,拒绝第180师撤过汉江的请求是理所当然的。按照第60军首长计算,“全兵团伤员须要三至四个夜晚才能转运完毕”^②,此时自然不可能轻易地同意掩护部队第180师先行后撤。而当第60军首长于24日晚接到第180师的报告,称友邻第63军一个师已经于23日晚后撤,加平进犯之敌,已渡江进至城隍堂,^③该军立即下令第180师北渡汉江,同时向兵团、志愿军司令部报告,建议第180师主力移到北汉江以北地区。^④第60军首长未待上级批准,即令第180师北移,这在当时条件下显然是正确、及时的。依照第60军的命令,25日拂晓,第180师主力已撤至汉江以北之北培山、鸡冠山、明月里、上芳洞地区。

由于第180师北移后,“未能确实控制要点”^⑤,25日上午鸡冠山经激烈战斗后失守。在这种情况下,第60军首长又下令第180师北移至蒙德山、驾德山、退洞里以北高地阻击。^⑥至此,应该说第60军首长的各项处置并无不妥。

25日下午14时,第60军首长接连照转了第3兵团首长的两道命令,先是令第180师两个团到马坪里背后大山组织防御,一个团占领驾德山阻击敌人。正当第180师先头部队已经向北出发,大部队准备继续北移之时,又转来第二道命令,改令第180师以一个团背抬转运伤员,两个团占领驾德山掩护转运。师长郑其贵于是又令已出发的第538团转回,坚决执行第二道命令。^⑦从实战经过以及参战者的回忆来看,这是第180师走向失利的重要一步。

当天下午,鉴于春川东北敌突破了墩城里以南阵地,西上里之敌渡江北犯,城隍堂之敌向华岳里方向进攻,第60军下令第180师移至芳继屯至新岱山一线阻击敌人,并令第179师之第536团在梧口南里控制阵地掩护该师北移。但由于时间已经是下午17时,第180师在移动中未译出电报,部队在山地小路中行军,又带着本师作战中受伤的300名伤员,行动缓慢,未能到达指定地区,^⑧于26日陷入重围。

从整个过程来分析,在不了解全局、部队不完整的情况下,第60军坚决执行兵团掩护伤员的命令,这不能说是“机械执行命令”。当发觉友邻后撤,第180师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时,第60军首长的几次处置大致都是合理的。该军军史中检讨认为“从战后来看,如能在战役结束时,迅速将第180师、179师转移到北汉江以北地区并肩组成防御,将第181师调作军二梯队,同时加强与

①陈忠龙主编《屡创奇迹的60军》,第405页。

②《资料之七:六十军党委会〈一八〇师突围战斗总结报告〉》,1951年7月31日,《关于一八〇师回撤失利》,第17页。

③《资料之十三:志司作战处关于六十军一八零师受损失经过材料汇集》,《关于一八〇师回撤失利》,第5页。

④陈忠龙主编《屡创奇迹的60军》,第412—413页。

⑤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抗美援朝战争史》第2卷,第341页。

⑥《资料之十三:志司作战处关于六十军一八零师受损失经过材料汇集》,《关于一八〇师回撤失利》,第5页。

⑦《一八〇师大事记述(初稿)》,一八〇师回忆录编委会编印,1992年,第30页。

⑧《资料之十三:志司作战处关于六十军一八零师受损失经过材料汇集》,《关于一八〇师回撤失利》,第5页。

友军联系,势必较当时态势有利得多。”^①这种看法,不无“事后诸葛亮”之嫌。

笔者以为,第 60 军首长最大的错误在于 5 月 25 日下午不加任何意见地照转了兵团首长两道互相矛盾的命令,这是不动脑筋的做法,引发了严重的后果。虽然主要责任不在第 60 军首长,但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倒是也属于“机械执行命令”的一种表现。

第 180 师自 5 月 26 日陷入包围之后,第 60 军数次组织接援,但因为兵力损耗较大、通讯联络不畅等因素,均未成功。有人认为“胡景义突围出来到军里汇报时,应立即派部队去接应,而军未下决心,从而失去了一次可救的机会。”^②胡景义是 29 日突围回归的,而第 180 师已于 27 日全部溃散,第 60 军军长韦杰、政委袁子钦认为“他们已分散无固定目标,即再牺牲一部分力量,恐也找不到”,^③故此没有执行兵团派一个师打进去的命令,避免了更大的损失。这一处置,也是无可非议的。

正因为第 60 军客观上存在困难(如两个主力师被配属给其它军,临时才归建),在当时条件下的决心处置并无太大的过错。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草稿)》中,主要批评的是第 3 兵团和第 180 师。^④韦杰在回忆录中也提到,“一九五二年十月周总理当面对我说过‘韦杰同志,一八〇师失利没有你的责任’。彭总在总司党委会上也说‘在五次战役中六十军对情况的处置是正确的’。”^⑤

三、关于第 180 师领导对失利负有的责任

第 180 师在陷入重围之后,广大指战员浴血奋战,在缺粮少弹的困境中坚持战斗,最后大部牺牲或被俘,他们对于整个战斗的失利是没有什么责任的。但是,第 180 师的领导干部是否也可以免除责任呢?或者说,第 180 师的领导干部是否因为执行命令太过于坚决,仅仅负有机械执行命令的责任呢?结合战役过程及第 180 师领导的表现来看,并非如此。

有关第 180 师师长郑其贵的任职经历,《山西新军决死第三纵队》一书中“孙灏正”条目是这样写的“孙灏正(1914-1990),又名郑其贵,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 年参加革命工作,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9 年由抗大一分校分配到决三纵队,任三十二团二营副营长,1940 年任三十二团第一、二营营长,同年 12 月任纵队兼太行三分区直属党总支书记。1942 年任决七团政治处副主任兼党总支书记、团政委。1945 年任晋冀鲁豫军区二十三旅政治部主任,1948 年任二十三旅副政委,1949 年任晋冀鲁豫军区八纵队二十四旅旅长(后改为一八〇师)。1951 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部管理处副处长、处长。1957 年任吉林省军区白城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64 年任司令员。”^⑥

有的学者根据这一条目,断言郑其贵于 1949 年初曾担任晋冀鲁豫军区第 8 纵队第 24 旅旅长,并据此认为郑其贵曾有担任旅级“军事主官的经历”,只不过是人们要为第 180 师失利寻找合理的解释,这段经历“遂遭到有意无意地忽略。”^⑦然而,事实上,《山西新军决死第三纵队》一书中有关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军精简整编善后工作办公室编《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军军史资料汇集(1947—1985)》,第 174 页。

^②王振邦《一八〇师受挫的始末》,《一八〇师实战录(征求意见稿)》第 3 册,第 11—8 页。

^③《资料之十三:总司作战处关于六十军一八零师受损失经过材料汇集》,《关于一八〇师回撤失利》,第 4 页。

^④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编写委员会《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草稿):一、战争简史》,第 53—54 页。

^⑤《韦杰回忆录》,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 年,第 162 页。

^⑥《山西新军决死第三纵队(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年,第 435 页。

^⑦许述、张振文《细说志愿军 180 师师长郑其贵》,《历史学家茶座》2010 年第 4 辑,第 120—127 页。

郑其贵旅长经历的记述有误,郑其贵从未担任过晋冀鲁豫军区第8纵队第24旅旅长一职。

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8纵队成立于1947年8月,首任旅长王墉。王墉于1948年3月22日在临汾攻坚战斗中牺牲,4月10日由邓仕俊接任。此后,邓仕俊一直担任该旅旅长。1949年2月全军统一编制,改第8纵队第24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0军第180师,邓仕俊又成为该师首任师长。1949年5月30日,邓仕俊奉令调任第60军参谋长,第60军第179师副政委郑其贵调任第180师师长。^①由60军军史可知,第8纵队成立后郑其贵曾担任第23旅政治部主任、副政委,1949年初全军统一编制后任由第23旅改编而成的第179师副政委,直至当年6月调任第180师师长,其间并没有担任过第24旅的旅长。^②

郑其贵军事指挥能力不强,和他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未担任过高级军事指挥员存在一定的联系。就在郑其贵接任第180师师长之后,该师在第60军编成内参加了扶眉战役。在向杏林镇合击的战斗中,第539团作为师第一梯队,发现敌有溃逃迹象,便越深沟穷追,郑其贵为求稳健,将该团撤回进攻三家堡,结果与友邻部队(第61军第183师)发生误会,相持一天,丧失了追歼逃敌的战机。^③这一战斗,反映出郑其贵在指挥上有怕冒风险、比较呆板的毛病。但当时已经到了解放战争的末期,对国民党军的几乎所有战斗都可用摧枯拉朽、风卷残云来形容,在这种大好形势下,郑其贵的弱点没有完全显露出来也是可以理解的。

作为师长,郑其贵在此次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的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首先是麻痹大意,不注意侧翼警戒。5月22日第180师已经知道了第39军、第15军后撤的情况,并且第180师副师长段龙章也由第187师侦察员那里获知右邻第63军正在后撤。22日下午,段龙章向军部报告了此事,第60军首长令第180师加强与第63军的联系。^④在这种情况下,第180师领导仍“认为敌人不可能有大的反击”,“忽视翼侧侦察警戒,友邻转移后翼侧完全暴露,敌即趁虚而入,占领了城隍堂”。^⑤24日晚部队撤过汉江后,“又麻痹大意,既未认真组织侦察警戒,更未控制城隍堂至马坪里之公路,对友军是单纯依赖而未主动联系。伤员大行李等非战斗人员仍留前沿,亦未及时转移。二十五日,城隍堂之敌沿公路插至该师侧后,春川之敌突破一七九师古城里防线,该师尚未发觉。至二十六日拂晓,敌继续进占马坪里、间村及其以北以西高地,该师遂被敌包围(实际上敌人并未发觉该师全部)”。^⑥第180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回忆,26日拂晓,“上山刚八十公尺,就听公路北山上敌人打枪。我代理政委,和师长在一起,我问师长,怎么北山打枪?他说,放心,那边是179师。行不远,又打枪,师长又说放心,走。又走十多步,敌人打炮过来了”,^⑦可见郑其贵麻痹大意到了何种程度。26日该师第539团第2营及第536团之一个连在梧口南里与敌激战,另有第539团第2营一部在马坪里与敌接触,在形势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该师领导还一厢情愿地认为在马

①《一八〇师大事纪述(初稿)》,第14页。

②《陆军第六十军序列变更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军精简整编善后工作办公室编《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军军史资料汇集(1947—1985)》,1985年,第3—6页。

③《一八〇师大事纪述(初稿)》,第14—15页。

④邓仕俊《我所记得的六十军参加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情况》,《一八〇师实战录(征求意见稿)》第3册,第11—2页。

⑤第六十军司令部作教科整理《第六十军反包围经验》,1952年3月13日,转引自《抗美援朝战争经验资料之二:我军防御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研究部,1962年7月,第125页。

⑥志愿军党委《关于一八零师受损失事件通报(节录)》,1952年7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史教学参考资料(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第1页。

⑦吴金锋记录整理《1983年10月6日对吴成德的访谈记录》,《安德舍笔记第一集》,第24页。

坪里的接触战是与友邻发生的误会。^①

其次是布置失当,未能控制要点。24 日晚第 60 军令第 180 师撤过北汉江,转至退洞里、三巨里地区,但该师行动迟缓,“没有日夜迅速脱离敌人,将主力占领退洞里、北培山以北新的纵深阵地,把城隍堂之敌变为正面,立于不败之地,而是将主力位于独河洞以南,侧翼仍然暴露,处在不利局面”。^② 25 日下午,在接到兵团两道不同的命令之后,郑其贵机械地强调执行命令,而缺乏冷静的分析判断,在部队已经后撤的情况下,强令重新返回。事后第 180 师的检讨认为,“造成严重损失最主要的关键”,是“二十五日未能将主力移到马坪里以北布防(完全可能),致二十六日拂晓被敌包围”。^③

此外,第 180 师在撤退、突围过程中的组织非常混乱,也是造成重大损失的主要原因之一。23 日,第 180 师已经得知全军都要后撤,但居然没有组织人员寻找向导、勘查过江地点及做好各种准备,以至于 24 日夜撤过北汉江时全师仅靠三条临时拉起的铁丝涉水渡过深处达两米的江水,全师一夜被江水冲走即达 600 余人之多。^④ 26 日拂晓第 180 师发觉被围之后,作为师长的郑其贵,不是立即组织坚决突围,而将大量宝贵的时间花在开会讨论和等待上级命令上,直到当晚 18 时 30 分部队才行动,且事先未作任何安排计划,领导干部也没有任何一人下去掌握部队,而是全都跟着先头部队跑。结果下面部队也争相逃奔,原本应该断后的部队甚至跑到先头部队的前面去了。^⑤ “二十六日一个夜间并没有经过激烈战斗即掉队失联络、伤亡五千余人(绝大部分是掉队的)”,27 日晨到达鹰峰时,第 180 师“全部已不及千人”。^⑥ 对此,志愿军党委会在通报中提出严厉的批评:“各级干部在情况紧急时,不是挺身而出,分头去掌握部队,却首先惊慌动摇,带领先头部队,争相逃跑;……更为军心动摇,斗志丧尽,上下离心离德,争相逃跑。突围时,沿途掉队失散,未至公路已溃不成军,这是该师失败的决定关键。”^⑦ 第 180 师也在报告中提到“二十六日阵地就形成被围,十时左右即发觉,但是决定突围时间较迟(十二时通知 540 团 538 团,16 时才通知到 539 团),未作突围的充分准备(深入动员、尽量找些吃的,可杀牲口,很好寻找道路,利用森林提前向公路运动),突围组织不严,箭头亦太少,纵深太长(共两路最好多头),既不能迅速争取时间,迅速通过封锁线,又造成大家怕明天过不去,互相乱挤乱插,在未经战斗前三个营即失掉战斗力(各团一营),尤其在紧张时期各级干部未能分头亲自掌握部队,给下级撑腰壮胆,又没有连续突围的思想准备,所以部队一过马坪里、城隍堂向公路就失掉掌握,散不成军,到鹰峰以后,全师无一完整建制连队,再不能进行大的战斗。”^⑧

①《资料之十三:志司作战处关于六十军一八零师受损失经过材料汇集》,《关于一八〇师回撤失利》,第 5 页。

②《资料之十:一八〇师司令部《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牵制作战及受挫检讨报告》,1951 年 7 月,《关于一八〇师回撤失利》,第 35 页。

③《资料之十:一八〇师司令部《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牵制作战及受挫检讨报告》,1951 年 7 月,《关于一八〇师回撤失利》,第 35 页。

④《一八〇师大事记述(初稿)》,第 29 页。

⑤吴金锋记录整理《被俘回归的原 180 师 538 团政治委员赵佐端 1954 年自述材料》,《安德舍笔记第一集》,第 37 页。

⑥《资料之七:六十军党委会〈一八〇师突围战斗总结报告〉》,1951 年 7 月 31 日,《关于一八〇师回撤失利》,第 19 页。

⑦志愿军党委《关于一八零师受损失事件通报》(节录),1952 年 7 月 19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史教学参考资料(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第 1—2 页。

⑧《资料之十:一八〇师司令部《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牵制作战及受挫检讨报告》》,1951 年 7 月,《关于一八〇师回撤失利》,第 35—36 页。

第180师在突围道路的选择上也是错误的,当时敌人并不知道包围了我第180师,整个包围圈存在很多空隙,应该组织力量顺公路争取打出来,但在避战思想下,第180师选择由山路突围,结果不但耗费了战士的体力,而且造成行动的缓慢。第180师参谋长王振邦就指出,在缺少粮食补给,体力不支的情况下,根本不应该去爬鹰峰那样的高山。“事后证明,不少部队、干部都是沿公路顺利突出来的。如师直二梯队和539团三营,就是没爬这座高山,在公路两翼与敌周旋,有情况时就上山隐蔽,无情况时就下山赶路,结果突出来了。”^①

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郑其贵的军事指挥能力欠缺固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在突然发生的变故前,惊慌失措的情绪占了上风。郑其贵自己在检查里承认:“被围后即丧失了斗志,首先表现出犹豫不决,只通报情况,自己不敢下决心,使下面没有充分时间进行准备,但最后的决心也是错误的。主要方针错了,不是拼的,坚决打出来的方针,而是逃跑的方针,……这是(时)自己只顾个人逃命,失掉了师长、共产党员的品质,把警卫员参谋也丢掉了,愿意人少,目标小,……只是害怕目标大,怕暴露自己是师长,最后也产生了自杀的绝望思想。”^②

这种惊慌失措的情绪在27日的突围中更是达到了顶峰。“二十七日七时到达烛台峰(有敌一个排)与乾野川(有敌小部)之间又被敌包围。师的领导干部更加动摇,错误的决定保存干部,分散突围(实质上是不要战士),瓦解了仅存的一点士气。以后报话机与军取得联系,军令坚决突围,并告距该师四十华里之史仓里有一七九师,故又决定集体突围,但人心已慌乱,动作迟缓一夜只走了十余里,拂晓始达鹰峰(笔者注:实际情况是先头部队走错路,误至滩甘里遭敌阻击,又折返鹰峰),遇敌一个排却不敢打,未及绕过,天已大亮,干部首先自行逃生,部队亦自行瓦解,途中仅一个山头有敌一排,竟使最后仅余之数百人,全部瓦解于鹰峰山下,实属痛心。此后干部不管战士,怕人多目标大,有的干部竟用欺骗或威胁等恶劣手段,逼走战士,致使该师遂全部瓦解。”^③

在突围过程中,师领导不顾掩护的战士,只管自己逃命。^④师代政委吴成德请求停留片刻处理伤员,其他师领导即弃之不顾,扬长而去。副师长段龙章为掩护自己突围,命令部队坚守某高地,突出去后竟顾不上通知掩护部队撤收,听任其被敌人包围消灭。^⑤有这样的师领导,当然也就有不顾一切只管逃跑的下级干部。如吴成德遇见第538团团长庞克昌,要求他带上同行的师政治部宣传干事张城垣,庞克昌却只答应带上吴成德一人,吴稍一犹豫,庞竟连吴成德也一起甩下不顾而去。^⑥第538团参谋长胡景义嫌突围时带的人多目标大,逐渐将所有跟随的人甩掉,最后甚至把他一起的同级干部也丢掉撒腿就跑。^⑦段龙章在检查中指出:“这次政治动摇是自上而下形成的,所以很普遍、面很广”,他认为“自己历史上的错误是一贯打仗不硬,发展到现在,经不起这次严重

①王振邦《一八〇师受挫的始末》,《一八〇师实战录(征求意见稿)》第3册,第11—7页。

②《资料之十一:〈郑其贵师长的检查报告〉》,1951年11月24日郑其贵在180师连以上党员干部会上的检查报告记录,《关于一八〇师回撤失利》,第39—40页。

③志愿军党委《关于一八零师受损失事件通报》(节录),1952年7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史教学参考资料(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第2页。

④吴金锋记录整理《1983年9月16日对蔡德荣的访谈记录》,《安德舍笔记第一集》,第52页。蔡德荣系段龙章副师长警卫员,在掩护师首长突围时受伤被俘。

⑤吴金锋记录整理《被俘回归的原538团1营3连排长郝明昌1954年自述材料》,《安德舍笔记第一集》,第83页。

⑥吴金锋记录整理《1983年10月对张城垣的访谈记录及张城垣1954年自述材料》,《安德舍笔记第一集》,第54页。张城垣为原180师政治部宣传干事。

⑦吴金锋记录整理《被俘回归的原180师炮兵主任郭兆林1983年6月20日访谈记录及1954年自述材料》,《安德舍笔记第一集》,第32—33页。

关头的考验,自己垮了,部队也垮了”,“在包围紧急的情况下,是恐慌动摇,由动摇到集体逃跑,集中干部逃跑到个人逃跑”。^①

第 60 军政委袁子钦批评说“干部宝贵不宝贵?干部是宝贵的,它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但脱离了群众的干部是不宝贵的,军队干部丢掉了战士,即不是宝贵的而是可耻的干部。”^②现在回头看,过去对第 180 师负责干部作的“政治动摇、右倾畏缩、贪生怕死”的结论虽然带有时代的印记,但“惊慌失措”、只顾自己逃跑的现象应该说还是存在的。第 180 师失利,从主观上来说,主要原因还是在师领导本身。

由战斗过程可知,对第 180 师而言,之所以陷入全军覆没的境地,有两大关键之处。一是 25 日下午在接到军部的两道相互矛盾的命令时,没有具体分析情况,只是机械地执行,甚至将已经出发的部队召回。二是 26 日下午的突围组织混乱,一夜间行军未经大的战斗,全师损失 5000 余人(绝大部分是掉队),导致部队完全丧失了战斗力。突围时,第 539 团及师炮兵营不在师部附近(隔一座山)。对这样一个主力团和炮兵营的撤退工作,第 180 师居然没有一位师级领导去布署,只派师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去通知了事,^③结果“五三九团一路因命令迟到,更为恐慌,不等一营撤回,即以行军姿态,仓荒率二营与团直先走,沿途争先恐后,草木皆兵,团直与一营遇见一辆破汽车即将部队吓散,虽未遇敌但建制已乱,过路后全团仅剩二百余人”。^④师领导所在的这一路也大同小异,“师直、五三八团、五四零团一路,过路时五三八团虽仅一个多连与敌接触,但过路后也只剩百余人。五四零团负全师的后卫掩护之责,而一、三营营长、政教在阵地上接到突围命令,未通知部队,首先只身逃跑,连排干部及战士亦闻风相率溃退,致该团战斗部队基本上在过路前已完全垮了,过路后尚余团直和收罗一部散兵共二百余人。全师突过加平至马坪里公路后人数已不足千。重机枪以上火器及通讯器材尽失(只配齐一部报话机)”。^⑤对以上两个关键的错误,显然应由第 180 师的领导负主要责任。

四、关于 180 师损失人数

在《屡创奇迹的 60 军》一书中,作者认为,“180 师第 5 次战役第二阶段参战实力为 7644 人”,“最后查明,按参战 7644 人,回归 4000 人计,180 师突围中损失 3000 余人”。^⑥但同书接下来的一段却又指出,“据关于战俘交换的有关资料统计,第 180 师第 5 次战役回撤中被俘约 4000 人”。^⑦如果突围中一共只损失 3000 余人,怎么可能有 4000 人被俘呢?况且,这还不包括战斗中伤亡的数字。可见,损失 3000 余人的说法是不可靠的。

据第 60 军军史资料统计,第 180 师在第五次战役中损失合计 8107 人,其中负伤 1808 人,阵亡

^①《资料之十二:段龙章副师长的检查报告》,1951 年 11 月 24 日段龙章在 180 师连以上党员干部会上的检查报告记录,《关于一八〇师回撤失利》,第 43—44 页。

^②《资料之九:60 军政委袁子钦关于 180 师受挫的总结报告》,1951 年 11 月 6 日,《关于一八〇师回撤失利》,第 31 页。

^③吴金锋记录整理《1983 年 6 月 26 日对王化英的访谈记录及王化英 1954 年自述材料》,《安德舍笔记第一集》,第 34 页。王化英为原 180 师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

^④志愿军党委《关于一八零师受损失事件通报》(节录),1952 年 7 月 19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史教学参考资料(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第 2 页。

^⑤志愿军党委《关于一八零师受损失事件通报》(节录),1952 年 7 月 19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史教学参考资料(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第 2 页。

^⑥陈忠龙主编《屡创奇迹的 60 军》,第 444 页。

^⑦陈忠龙主编《屡创奇迹的 60 军》,第 445 页。

524人,失踪5775人。^①这个统计虽然是该师整个第五次战役期间的损失,但由于战役前两个阶段部队均处于主动进攻状态,损失并不大,可以认为损失中的主要部分是在回撤阶段发生的,尤其是失踪人员,大部分是在回撤中牺牲或被俘了。

志愿军司令部在战役后的5月31日14时上报军委的电报中仅提及,“二十九日晨,据兵团电话报告,该师副师长带数十人出来,但详情迄今未报”。^②同日,第60军致电彭德怀、邓华,告知:“副师长段龙章、参谋长王振邦、538团参谋长胡景义已到我处,似此已无成大股者,……,现已收容约1300人。”^③

6月1日,第60军军部上报的情况是“至今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参谋长王振邦,及五三九团团团长和五三八团参谋长等已先后归队,加上该师零散人员及五四零团之二营(该营担任军后勤监护)等共约二千余人,全师损失近八千余人,其中伤亡二千,其余大都掉队失散。”^④

6月3日,第3兵团上报的材料中称“现该师仅有事前撤出的第二梯队(机关非战斗人员)及随军后勤担任掩护的五四零团第二营,突围出来的五三九团一营(四十余人)及该师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参谋长王振邦,五三九团团团长,五三八团参谋长等共计近四千人,损失七千余人(这七千人中,估计突围战斗伤亡二千人,被敌俘五、六百人,吃野菜,野草中毒及饿死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失散),目前正在继续收容中。”^⑤报告中提到的“事前撤出的第二梯队”,系指第180师机关科室人员、文工队、医院及直属连队和炮营的非战斗人员所组成的师第二梯队,由师军务科长张杰、直工科长王一民率领突出包围圈,共计440余人。除此之外,与二梯队一起突出包围的还有第539团第8连等。^⑥但是,相隔仅两天,在并无大股人员归队的情况下,归队人数为何由2000余人陡增到近4000人呢?显然,6月3日第3兵团上报报告中的“近四千人”,不仅仅是第180师突围后被收容的人数,还应该含有提前撤退的伤员、在后方留守的人员以及第一阶段负伤尚未归队的人员等,这是第180师全师剩余人员的总数。这一点,可由1951年7月第180师司令部上报的“突围战斗减员统计表”得到证实。该统计表显示,该师在突围战斗中,负伤1616人,阵亡456人,情况不明(掉队、被俘、失散)5572人,全部实力有4000余人。^⑦这个统计数字与第60军军史资料中的“减员消耗损失统计表”数据基本吻合,也说明只损失3000余人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

令人不解的是,7月31日第60军致兵团、志愿军司令部、西南军区并川西军区的“一八〇师突围战斗总结报告”说“一八〇师自二十八日分散突围后至今已突出归来人员,计有正付师长、参谋长、团长等以下300人左右。”^⑧这个数字与第60军5月31日、6月1日以及第3兵团6月3日的报告所称的归队人员数目有很大的差异。

但由前述历次报告可以推断,第60军7月31日报告中的“300人”左右,很可能是“3000人左

①《第六十军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减员消耗损失统计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军精简整编善后工作办公室编《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军军史资料汇集(1947—1985)》,第168页。

②《资料之十三:志司作战处关于六十军一八零师受损失经过材料汇集》,《关于一八〇师回撤失利》,第1页。

③1951年3月31日13时30分,60军致彭德怀等的电报。引自《屡创奇迹的60军》,第438页。

④《资料之十三:志司作战处关于六十军一八零师受损失经过材料汇集》,《关于一八〇师回撤失利》,第2页。

⑤《3兵团关于180师受损失经过及检讨》,1951年6月3日,《资料之十三:志司作战处关于六十军一八零师受损失经过材料汇集》,《关于一八〇师回撤失利》,第2页。

⑥张杰、王一民《二梯队突围脱险记》,《一八〇师实战录(征求意见稿)》第3册,13—1页。

⑦陈忠龙主编《屡创奇迹的60军》,第444页。

⑧《资料之七:六十军党委会〈一八〇师突围战斗总结报告〉》,1951年7月31日,《关于一八〇师回撤失利》,第19页。

右”之误,相差了一个零。^①这多半是收发或抄写时的错误,并非有意为之。

这也可以从第 180 师入朝时实力资料中得到印证。第 60 军入朝之前的人数为 40822 人(其中干部 4558 人,班以下 36264 人)。^②第 60 军所辖之第 179 师 1951 年 2 月编入志愿军序列时,全师辖三个步兵团及山炮营、教导营、工兵营、通信营、侦察连、警卫连、担架营、卫生营、运输营、文工队和军乐队,一共 11063 人(其中干部 1380 人)。^③虽然没有第 180 师入朝人数的统计数字,但第 180 师实力与 179 师应基本相当。

根据第 60 军 6 月 1 日的报告(收容二千余人,损失近八千余人),第 180 师全师人数约 10000 余人;根据第 3 兵团 6 月 3 日的报告(剩余四千余人,损失七千余人),则第 180 师全师人数约 11000 余人;由 1951 年 7 月 180 师司令部上报的“突围战斗减员统计表”亦可得知,该师总人数约 11000 余人。

上述 3 份统计资料所反映的第 180 师的损失和剩余人数,与第 180 师的实际总人数是相吻合的。《屡创奇迹的 60 军》一书中提出“180 师第 5 次战役第二阶段参战实力为 7644 人”,并以 7644 人为基数来计算损失和剩余人员数,显然不符合第 180 师实力的实际情况。另一有趣的现象是,这个 7644 人的数字,和前述的 1951 年 7 月第 180 师上报的“突围战斗减员统计表”中的突围损失数字之和正好一模一样(负伤 1616 人,阵亡 456 人,情况不明 5572 人),有理由相信作者是误将第 180 师突围损失的人数当作了第二阶段参战人数,由此带来了计算上的误差。

由以上分析可知,第 180 师入朝时人数大约在 11000 人上下,后撤阶段除部分人员外(如担任军后勤警戒的第 540 团第 2 营、留守的师教导大队等),包围圈内的人员损失高达 7000 余人,突围被收容的人数大约 2000 余人或 3000 人左右(部分伤员可能存在重复计算),第五次战役后全师剩余人数约 4000 人左右。整个第 3 兵团在第五次战役中伤亡失踪被俘共 39558 人(其中阵亡 6577 人,负伤 16911 人,失踪被俘 16070 人),第 180 师的损失占到了近五分之一,是此次战役损失最严重的一个师。

(责任编辑 尹正达)

^①无论突围归队 300 人还是 3000 人,对 180 师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此时缩小或夸大损失人数并无多大的意义。

^②《第六十军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实力发展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军精简整编善后工作办公室编:《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军军史资料汇集(1947—1985)》,第 166 页。

^③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一七九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一七九师革命战争史简编》,1979 年 8 月 1 日,第 166 页。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军精简整编善后工作办公室编《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军军史资料汇集(1947—1985)》中的统计数字与此稍有差异。